人工智能时代下青年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及对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思颖

当今社会正经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深刻变革。以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加速，重塑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入渗透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学习与思想认知领域。青年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中的关键主体，维护青年意识形态安全关乎青年健康成长与价值实现，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复兴。在人工智能赋能的数字环境中，意识形态传播、渗透与博弈更趋隐蔽化、复杂化与智能化，人工智能场域逐步成为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滋生、流转和扩散的新空间。

一、人工智能时代下青年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涵

人工智能时代由数字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发展而来。数字时代的核心是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普及；大数据时代的核心是数据资源规模化与资产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核心是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和算法深度应用。三者逐级递进。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前沿突破，特指基于大规模预训练模型自主学习并创造高拟真度内容的AI模型，核心特征是内容自主创造与定制化，将AI能力从分析决策提升到内容创造与定制，对意识形态安全产生新的深刻影响。

意识形态安全特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和引领作用得以稳固，其作为青年普遍认同和自觉践行的精神支柱状态未受根本性威胁和挑战，是相对动态的平衡。青年的知识体系、思想观念、心智情感尚未成熟，需要加强引导和塑造。在人工智能深度介入语境下，青年意识形态安全是由政治认同、认知主权与价值对齐共同构成的动态体系，包括政治认同的稳定性、认知主权的独立性及价值对齐的契合性。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安全已演变为人机深度博弈的动态过程，技术直接参与青年思想认知建构，但技术运行逻辑和意识形态引导逻辑之间存在张力。

二、人工智能时代下青年意识形态风险的生成路径

人工智能因数据偏见、算法黑箱与内容幻觉衍生结构性风险，其风险沿“数据—算法—内容”逻辑链条系统性传导，数据环节埋下价值偏见，算法环节固化认知环境，内容环节实现失真内容的定制化输出与渗透。

在数据环节，从行为采集到价值偏见，青年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日常行为、兴趣偏好乃至情感波动均可能在数字平台留下可追踪、量化、分析的数据痕迹。数据在青年认知中常以客观事实面貌呈现，技术客观性遮蔽背后隐蔽的价值筛选与预设。一旦偏见数据被算法模型学习放大，对青年意识形态的潜在侵蚀更具隐形性和迷惑性。在算法环节，算法黑箱机制下存在认知固化。算法是风险传导的关键中介，将数据偏见转化为系统性认知偏差，核心在于对青年认知环境的结构性塑造，导致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固化。信息茧房隔离异质信息，回音室效应将具有相同窄化认知的个体聚合起来并放大、极端化窄化观念。在内容环节，GAI定制与内容失真爆发构成风险出口。GAI输出常被青年赋予技术权威光环，青年倾向相信AI结果是客观、理性、中立的，忽视内容背后算法设计者和数据源的价值预设。

风险汇聚下，核心风险挑战为：主体性弱化，个体政治倾向和心理弱点被算法精准锁定，风险从群体冲击转变为个体博弈，传统集体性防御机制出现盲区，青年可能无感知丧失价值判断主动权；认知窄化，算法黑箱引发共识碎片化，信息茧房导致青年群体内部认知极化，社会公共对话空间被碎片化认知取代，不同圈层青年无法达成基本价值共识，国家安全所需社会心理根基面临动摇；信任危机，内容幻觉导致权威边缘化，“技术权威”对“教育权威”僭越，青年盲目信任AI生成虚假结论，认知权威转移，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逻辑面前面临失语和失效的系统性危机。

三、多维协同的青年意识形态安全治理路径

面对系统性风险，单一治理手段效果有限，需坚持“系统治理、协同联动、以技制技”原则，构建法律约束、技术干预与教育引领“三位一体”综合治理路径。

强化法治监管，针对主体性弱化问题压实平台责任。核心是通过法律手段划定技术应用红线，将算法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深化数据伦理立法，保护青年认知主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基础上，针对青年群体制定更细化的数据使用准则，严禁平台利用算法过度挖掘青年政治立场、心理弱点等高度敏感数据。健全算法备案、算法审计常态化机制，督促平台优化推荐逻辑，遏制同质化、诱导性信息推送。完善违规惩戒与溯源追责链条，推动平台构建AI内容风险识别体系，及时拦截隐蔽渗透信息，以刚性法治约束筑牢青年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推进技术治理，针对认知固化推动算法干预。算法黑箱是加剧信息茧房和回音室效应的原因，需将算法治理从模糊黑箱推进到可解释、可监督阶段。实施算法可解释性要求，推动出台算法推荐服务国家标准，要求平台对涉及意识形态和公共利益的关键推荐逻辑提供有限、非商业核心的解释框架，定期发布算法导向对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评估报告。引入算法审查和监管沙盒，建立独立第三方或政府监管机构，对平台主流推荐算法进行安全审查。

创新教育范式，针对信任危机重塑教育引领力。核心是推动思政教育数智化转型，用有温度的技术赢回青年的认知信任。针对传统教育引领力失效与认知权威转移挑战，核心在于改变思政教育话语模式和传播场景，以技术优势克服技术带来的挑战，用有温度的权威取代冰冷的技术权威。在教育主体层面，打造智慧思政生态，高校可主动占领智能化阵地，开发基于国产大模型的“AI思政导师”。在青年主体层面，普及媒介素养教育，构建青年个体认知韧性。将人工智能伦理与数字信息素养纳入教育体系，通过课程训练引导青年理解算法逻辑、识别深度伪造手段、辨析AI生成的事实与观点，培养数字批判性思维。

结 语

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如何统一、青年主体性如何守护的时代命题，是一项人机协同、价值引领、多方共治的系统工程。法治监管划定技术运行的制度红线，技术治理提供“以技制技”的实操手段，教育范式创新则从主体层面重塑青年的认知韧性与数字批判能力，三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唯有将制度约束、技术向善与价值引领贯通起来，才能构筑维护青年意识形态安全的立体化屏障，在释放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同时守住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主导权，使青年在智能时代保持清醒、独立与坚定，为民族复兴凝聚更为持久、更为可靠的精神力量。

数字叙事赋能思政沉浸式教学的模式构建研究

□安徽三联学院 吴福寿

传统思政教学以教材为依据，以教师的理论讲授为核心，思想内涵的传递停留在认知表层，学生难以建立与主题内容的深层情感联结。根据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的观点，沉浸指的是“当人们在进行某种日常活动时，完全投入情境当中，过滤掉所有不相关的知觉，伴随高度的兴奋感和充实感，甚至忘记时间的流逝”。沉浸式教学是让学生全身心投入教学情境，实现知识习得、技能提升与价值内化相统一的新型教学范式。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重构了信息传播的形态与路径，也为思政教学的形态革新打开了新的探索空间。以数字叙事为载体的沉浸式教学在一线已有零散实践，但多数停留在技术工具的浅层应用层面，尚未形成系统性运行框架。本文从内容转译、场景搭建、交互设计三个维度切入，探索数字叙事赋能思政沉浸式教学的路径，为思政课数字化转型提供参照思路。

一、课程内容的数字叙事转译

课程内容的数字叙事转译，是思政沉浸式教学的基点。思政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教材表述多以逻辑推演为线索，强调体系完整性与论证严谨性。数字叙事注重情境化的表达，通过具体的叙事脉络带出抽象的理论观点，让学习者在情境感知中自然理解理论背后的现实逻辑。二者的表达方式存在天然差异，教师要找准理论内涵与数字叙事的契合点，跳出线性论证结构的窠臼，对原有内容进行拆解与重组，重新编排叙事的节奏、视角与信息密度，用符合数字传播逻辑的形态承载原本严肃的思想内涵。不同主题内容的转译要点有所区别，理论性强的内容，侧重搭建清晰的叙事逻辑线，让学生了解理论的演化历程，情感属性强的内容，侧重渲染叙事的情绪氛围，深化学生的情感体验。转译后的内容既要保留原本的思想厚度，也要具备数字叙事的代入感，为后续的场景呈现与交互设计筑牢稳固的内容根基。需要注意的是，内容转移要平衡好叙事趣味性与主题严肃性的关系，避免过度娱乐化稀释思想内涵，使沉浸式教学沦为表层的感官体验。

二、叙事空间的沉浸场景搭建

很多学生的思维方式以直观思维为主，围绕教学内容，搭建具象场景，契合学生的认知心理，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让学生产生很强的代入感，而代入感，正是沉浸式学习的关键。教师要利用数字技术，跨越时空还原历史场景、模拟现实情境，从课程内容出发，让空间场景顺着叙事节奏逐步展开，引导学生自然进入情境。教学适宜性与细节真实性是场景搭建的两大基本要求，在教学适宜性方面，不同的教学时长、不同的学生群体，对场景的复杂度要求存在明显差异。在常规课堂教学场景下，叙事空间不宜过于庞杂，要聚焦核心叙事线索，避免过多分支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技术手段的选择要始终服务于叙事需求，让场景真正成为承载思想内涵的空间容器。在细节真实性方面，脱离真实背景的炫技，不仅难以发挥场景的教学价值，反而会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违和感，消解思政内容本身的说服力。过度堆砌特效，营造视觉奇观，会打断叙事的连贯性，降低沉浸体验的整体质量。要注重建筑、服饰、器物等细节，确保其贴合对应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语境。

三、认知路径的分层交互设计

交互性是沉浸式教学的重要属性，交互环节的设置，也是推动学生从被动接收向主动探索转变的关键支撑。教师要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以数字叙事为载体，做好分层交互设计，让学生在层递式的互动中，加深对课程内容的认知。最基础的交互指向感知层面，通过简单的视角切换、细节放大等操作，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叙事中的关键信息，建立对叙事场景的初步认知。这类交互操作门槛低，主要作用是调动学生注意力，激发其学习动机，打破传统讲授中学生的被动定位。进入认知层面后，交互设计更侧重引导学生思考不同选择带来的叙事走向。通过设置关键决策节点，让学生在不同的路径选择中对比后续结果，进而理解主题背后的深层逻辑与价值取向。这类交互的主要目的是触发学生的深度思考，避免“为了交互而交互”的形式化问题。价值层面的交互，通过叙事冲突的设置触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让其在真切的情绪体验中完成价值内化。从感知到认知再到价值的递进式交互，让学生始终处于思政教学的中心地位，契合沉浸式教学的要求。当然，交互设计并非越丰富越好，冗余的操作指令会打断叙事的连贯性，消解沉浸体验的连续性。交互节点的设置要少而精，每一个节点都要服务于思想内涵的传递，推动学生的学习从表层感知向深度认同演进。依托数智载体搭建起感知、认知、价值层层递进的交互链条，红色文化教育方能跳出单向宣讲的固有模式，真正实现入脑入心，持续夯实青年学生的红色价值根基。

结 语

数字叙事与思政沉浸式教学的融合，是思政课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探索方向。在推进过程中，既要把握数字技术带来的形态革新机遇，也要始终坚守思政教育的育人本质，警惕技术异化带来的内容空心化倾向。通过内容、场景、交互三个维度的协同发力，为思政课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思政教育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内化的深度转变，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重点研究项目“数字叙事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创新研究”（编号：2024sxzz090）项目成果。

调查研究驱动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路径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智慧 赖继年

2022年中共党史党建学被设立为一级学科，学科建设进入体系化推进阶段。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根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学科理论创新不能单纯依靠文本推演，调查研究是本学科知识生产的基础方法，也是维系学科理论生命力、推进实践经验上升为学术理论的关键途径。但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阐释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要义上，或是单独讨论调查研究的方法论价值，将调查研究融入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相关探索仍有拓展空间。对此，需要厘清二者内在逻辑，分析现实短板，探寻可行的建设路径。

一、调查研究与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逻辑关联

一是调查研究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原创知识生成的实践源头。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党的建设实践，学科知识的获得离不开对一手经验材料的掌握。不论是史料考证还是基层实践观察，都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来获取丰富的口述资料、档案文献与一线案例，为学科理论的提炼提供最原始的素材。如果脱离调查研究，相关研究就容易局限于二手文献，难以形成源于实践的原创性认识。

二是调查研究是塑造学科主体性、承载时代育人使命的重要依托。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形成具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概念范畴与理论表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出能够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这种概念提炼不能停留于理论推演，必须依托鲜活的政党实践，才能真正彰显学科理论特质。立足我国丰富的政党实践开展调研，能够避免直接套用西方政党理论阐释我国政党实践。调研既可以梳理党史党建经验作为学科知识体系建设参考，也能将鲜活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兼顾学科建设与新时代人才培育的双重功能。

二、依托调查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现存短板

一是调研偏向文本研读，形式主义问题制约真问题发掘。部分研究习惯于从文献中寻找选题，实地调研力度不足。少数调研还存在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蜻蜓点水式调研等问题，相关走访浮于表面，很难捕捉基层党建中存在的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以这种形式推进学科调查研究容易造成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脱节，降低理论成果的解释力。

二是调研成果转化不畅，协同调研与人才培养之间存在短板。调研形成的大量案例材料大多分散保存，缺少系统化的分类整理，使实践经验难以提炼上升为学科理论命题。此外，调研多为学者个人独立开展，跨机构联合调研不多。同时，部分青年研究者也缺少系统实地调查训练，调研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以调查研究系统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一）坚持问题导向，依托调查研究挖掘本土研究选题，夯实知识体系实践根基

依托调查研究能够将历史现场与当代实践贯通。面向历史现场开展史料调研，走进革命旧址和地方党史场馆，通过查阅地方档案、收集口述史料，能够还原不同历史阶段党组织运行与群众工作开展的真实面貌，挖掘地方珍贵历史素材，丰富党史研究的基础资料。同时，通过调查研究能够深入基层一线捕捉新时代党建实践命题，走进乡村、社区、机关、国有企业、学校党组织，采取解剖麻雀式蹲点调研，近距离观察基层组织建设、党员教育管理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真实状态。在调研过程中倾听人民群众和一线党务工作者的真实想法，梳理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基层遇到的现实难题转化为学科研究选题，让学科研究扎根党的实践土壤，从源头上避免理论研究的空泛化，为自主知识体系筑牢实践根基。

（二）坚持史论互证，健全转化协同机制，凝练学科标识性概念

在扎实调研的基础上推进史论互证，贯通百年党建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党建创新实践。一是要对调研收集的案例材料进行学理化提炼，将基层可复制的实践做法转化为规范化的学术表达，凝练契合中国政党实践的原创范畴。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本土实践总结中国规律，拒绝简单移植外来理论框架解读党的建设实践，持续充实学科知识要素。三是同步完善调研成果转化机制，搭建共享化的调研案例资源库，分类归集历史调研资料与基层党建典型案例，推动调研素材共建共享。四是推动调研形成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规范化的学术论文、理论读本或教学案例，同步实现学科建设与育人目标。五是要搭建多方协同调研格局，整合高校、党史研究机构及基层党组织力量开展联合专题调研。最后，要持续强化人才培养，将调查研究能力纳入学科人才培养环节，培育能够扎根实践开展研究的青年学术队伍，弘扬求真务实的调研作风，持续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储备研究力量。

结 语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赋予学科的重大任务。持续依托调查研究从党的实践经验中提炼原创理论，完善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能够不断增强学科主体性，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学科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扎根实践开展调研，持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只有立足新的实践持续深耕，才能产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发挥党史党建学科资政育人的独特价值。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提升路径与实践机制

——基于赛训结合模式的实践思考

□黑龙江工程学院 王 璇

基层党支部书记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骨干力量，关系到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面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不少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面临“能力短板”挑战，存在“本领恐慌”现象。某地方高校党委组织部确立“以赛促建、以训提能”工作思路，通过深入调研精准识别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能力现状与短板，探索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赛训结合”培育模式。

一、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的能力短板

总体来看，当前高校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在知识结构、业务能力和创新思维等方面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上述高校首届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的“全景式检阅”中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理论素养与掌握实务知识的系统性有待加强

在大赛初赛基础知识测试环节，部分选手对党的创新理论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要求等掌握不够深入，存在碎片化、浅表化的现象。在组织生活方案设计上，部分方案创新性不足，未能充分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和师生实际，理论知识向实务转化能力不足。

（二）解决党支部实际问题的“实战”能力仍有欠缺

在半决赛“谈心谈话”环节，部分党支部书记在应对支部党员发展中的矛盾、化解支部内部思想问题、处理师生利益诉求时，专业知识、沟通技巧和应变能力稍显欠缺。大多谈话定位不准，多停留在事务性问题处置层面，对党员思想背后深层次动因挖掘还不够，思想引领的针对性不足。

（三）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存在脱节

在总决赛“微党课和理论宣讲”环节，部分选题和案例脱离本支部、本专业实际，与教学科研、学生管理等业务工作结合不够紧密，挖掘身边师生、支部案例不够鲜活，内容代入感不强，宣讲感染力较弱，党建业务“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

（四）培训课程的针对性还不明确

对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不同的支部书记来说，他们需要被培训的课程内容有所不同。新上任的支部书记急需基础党务规范、实操流程等实务性指导以获取入门级知识。而任职时间较长的资深书记，需打造特色党建项目或创新案例。学校培训缺少根据支部书记的岗位特点和成长需求来确定具体培训内容的机制。

二、“赛训结合”模式的实践探索

科学设置比赛赛程。大赛设置“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和大学生党支部书记“双赛道”，涵盖初赛、半决赛和总决赛三个环节，包含基础知识测试、组织生活方案设计与案例编写、谈心谈话情景模拟、微党课及理论宣讲，全方位考验支部书记的能力素质。

营造“比学赶超”氛围。大赛笔试环节展示基层党支部书记扎实的理论基础，谈心谈话环节展示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微党课及理论宣讲环节将政治引领与业务工作有效融合，大赛全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思想政治引领与价值塑造。参赛选手及观摩人员通过比赛可以近距离学习优秀案例和实操技巧，对基层党务工作者内生动力发挥了明显的激励作用。

促进成果运用转化。赛后，党委组织部系统整合赛事中涌现的优秀案例、微党课和理论宣讲材料，汇编成册发放给各基层党组织，形成学校党务工作优质学习资源，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有效推动大赛成果长效化育人。

三、完善能力素质提升长效机制的对策

（一）实施分层分类培训体系

分层方面，对于新任党支部书记重点开展党务基础知识、工作规程等基本培训，可配置导师实行“一对一”帮扶。针对任职两年以上的党支部书记，培训可重点聚焦提升创新能力和党建品牌策划能力。分类方面，“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要积极探索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等实现党务、业务“双融合”的方向；针对大学生党支部书记，侧重在学生成长成才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打造赛训结合常态化

党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作为检验培训成效、选拔优秀人才、展示党建成果的重要载体，要将此类比赛纳入学校长效管理制度，确立每年或每两年举办一届的机制。注重赛后总结与成果转化，形成“比赛—反馈—改进”闭环，将大赛中涌现出的优秀微党课、优秀案例作为党员教育培训的鲜活教材。

（三）深化“实战式”锻炼，破解“知行脱节”难题

在培训中增加情景模拟教学，就发展党员、谈心谈话、组织生活会等重难点工作开展实战演练和案例回顾。大力支持党支部书记结合学校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申报基层党建创新课题，持续提升综合履职能力。

（四）强化激励保障，激发“头雁”队伍内生动力

完善基层党支部书记考核激励机制，把党支部书记日常参训表现、参赛实绩、支部建设成效纳入评优表彰、职务晋升、职称评审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健全“双带头人”政策保障与激励机制。挖掘宣传先进典型，发挥“头雁”作用，壮大“领雁”队伍，不断增强党务工作者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结 语

“以赛促建、以训提能”是锻造党支部书记“头雁”队伍的有效路径。持续完善分层分类、实战赋能的赛训长效机制，强化激励保障，推动党建工作与教学科研深度融合，破解本领短板与“两张皮”现象，不断夯实高校基层党组织根基，以高质量党建支撑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危机与认同：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建设同频共振的价值机理

□宿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时会永

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依赖于青年群体的主体认同；而主体认同的实现，取决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忽视对青年学生文化主体性的培育，意味着思政课目标中心的缺失和价值的空场。二者的协同建设需以解剖其突出危机为逻辑起点，以共建价值目标为内核纽带，以认同建构为实践路径，实现同频共振。

一、课堂失语与主体迷惘：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叠加

思政课“失语”于青年话语表达。思政课的语言表达方式与青年的个性化叙事之间存在“语言鸿沟”。传统思政课话语体系偏重于居高临下式的理论化、灌输性与宏大思维，充满了“必须”“应该”“要”等规训性指令。而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青年，其话语习惯于在平等对话基础上的碎片化、圈层化与主体参与性表达，由此使得思政课与青年的日常语言体系脱节，形成语言障碍。

思政课“失语”于青年价值表达。思政课旨在进行系统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价值引领，其供给的往往是高度概括的抽象性理论。而青年的价值世界多元多彩：他们既追求“诗和远方”，也关注“柴米油盐”；既认同家国情怀，也强调个体权利；既受传统文化影响，也受西方思潮冲击。这种“意义的分化”使得思政课难以用一套“包打天下”的价值表达体系吸纳所有青年，难以满足青年对人生道路和现实困境突围的深层次需求。

思政课“失语”于青年大学生的主体认同危机。当代青年在意义“虚无”与“焦虑”、价值“散焦”与“迷失”中，遭遇着深刻的主体性危机。传统思政课在自己的理论逻辑体系中，经常忽略文化传递的“身—心”一体过程，多局限于从文本到文本、从经验到经验、从理论到理论的传输，较少运用艺术、实践、仪式等具身化载体，其叙事视角对于青年来说是外在的、旁观者的，亦即“他者”视角，与青年的生命体验和生活逻辑脱节甚至相悖，导致话语空转，难以讲述“我们”共同的故事。且当今时代全球化、数字化、资本化、个体化的文化汪洋，共同建构且不断完善着一套强大迷人的替代性意义系统，通过制造情感共鸣、提供身份认同、许诺个性解放等方式浸润着青年。相比之下，传统思政课提供的意义系统显得抽象刻板、说教无趣，在意义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常常被熟视无睹。

二、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目标趋同

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危机叠加态，本质上是数智时代古今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的“价值认同”危机，亦深刻揭示和反向诠释了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建设在文化使命上的深度共振和理想奔赴。思政课的目标是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青年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个体社会化与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获得文化归属感和价值方向感。二者的核心诉求与实践逻辑，共同指向青年一代情感共鸣的建立与价值认同的塑造。二者最终都服务于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帮助青年建立稳定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二者情感共鸣的基点具有一致性，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对革命文化的尊崇与弘扬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践行与融入。二者情感共鸣的生成机制包括三个层次：符号层面的意象共鸣、仪式层面的参与共鸣和叙事层面的意义共鸣。通过“文化认知—文化情感—文化实践”这样一个多层跨越的过程，青年能够在文化探索中“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建构”，实现精神独立性的强化与价值观的深度内化。

二者价值认同的内核具有一致性，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上相契合。青年在个体的文化实践中，通过各种符号、语言和意义表征，经过个体思考、情感体验和实践检验后，最终确认“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相信什么”的价值皈依。思政课有效融入青年的文化实践中，助推青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认同和主动践行。

思政课的“失语”本质上是“价值供给”与“青年需求”的错配，而非思政课本身的“无能”。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立足主体性理念，以平等的姿态走进青年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用他们的语言、视角共生共创，从自在、自觉走向自为。

三、意义同构与生活同在：思政课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共进之路

“意义同构”在于通过对话、转化与创新，共同构建一个既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又契合个体生命体验的、鲜活生动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的达成，需要作为价值传导主体的教师深入挖掘思政课传递的宏大叙事、国家价值如中国梦、共同富裕、人民立场等，与青年在微观生活中追求的个体价值如自我实现、公平正义、生活品质等之间存在的深层意义连接点和共鸣区。“生活同在”强调思政教育必须深度嵌入青年的“生活世界”，积极参与青年的具体日常生活实践，如数字生存、圈层互动、消费选择、职业发展、情感关系等。价值传导主体需要超越简单的“引领—服从”或“抵抗—收编”的二元思维，明确“生活同在”的教育场域转向，将教育场域从课堂延伸至青年完整的数字化日常生活实践，为思政课提供坚实的生存论基础。

本文系江苏省2024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中国话语”案例体系研究》（2024SJSZ1040）研究成果。